

影响文库
—INFLUENCE LIBRARIES—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十大经济学家

【美】约瑟夫·熊彼特 著

荟萃改变了世界的顶级经济学大师 读懂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来龙去脉

TEN
GREAT
ECONOMISTS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 013060875

K815.31

26

文库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 十大经济学家

【美】约瑟夫·熊彼特 著
狐咪咪 译



北航

C1667229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 • BEIJING

K815.31
26

013080872

内 容 简 介

本书的内容是熊彼特在1910—1950年间为各个经济学杂志(除了关于马克思的那一篇外)写的十篇经典的评述性文章,对影响世界经济学的十大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从马克思、瓦尔拉、门格尔,到马歇尔、帕累托、庞巴维克、陶西格,再到费雪、米切尔、凯恩斯,对他们的经济学说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和评价。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十大经济学家/(美)熊彼特著;狐咪咪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7

ISBN 978-7-121-19112-1

I. ①从… II. ①熊… ②狐… III. ①经济学家-列传-世界 IV. ①K81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5221号

策划编辑:张 昭

责任编辑:谭丽莎

印 刷: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710×1000 1/16 印张:16.75 字数:229千字

印 次: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9.8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88258888。

序 言

本书所收录的这些文章都写作于 1910—1950 年这 40 年间，最早的 3 篇（瓦尔拉、庞巴维克、门格尔）是用德文写的，而其余各篇都是用英文写的。除了关于马克思的那一篇外，其余的都是在一些杂志上刊载过的文章，有的是为某位经济学家的去世而作，有的是为了某些重要事件的周年纪念而作，如纪念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发表 50 周年、纪念帕累托诞辰 100 周年等。因为这些文章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匆忙写成的，熊彼特本人认为将它们汇编出版的价值不大，但有时又难免需要用到这些文章，而刊载它们的杂志又不易找到，所以在 1950 年 1 月，也就是熊彼特去世前几个月，他还是同意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将它们整理出版。

这 10 篇主要的文章，除了关于马克思的那篇之外，都是由熊彼特自己选定的。他本计划收录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 100 周年而为《政治经济学杂志》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社会学与经济学》（1949 年 6 月）这篇文章，但是后来我们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的第一部分《马克思的学说》取代了它，因为它更全面地论述了作为预言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对世界产生影响的马克思。我非常感谢卡斯·坎菲尔德先生和哈培尔兄弟出版社，他们慷慨地答允了我的请求，这篇文章才得以收入本书中。在这里，我还要对《经济学季刊》、《美国经济评论》及《经济学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商们表示感谢，是他们同意将原本刊登在自

己杂志上的文章收入本书中。此外，还有一些文章刊登在《国民经济》杂志上，不过该杂志已经停刊了。

根据哥特弗里德·哈伯勒教授的建议，我们将关于克纳普、维塞尔和鲍尔特凯维兹的三篇短文收入附录之中，他认为应该重新出版它们，并和其他传记体的文章一起选入本书。这些文章分别是熊彼特作为驻奥地利通讯员（1920—1926年）和驻德国通讯员（1927—1932年）为《经济学杂志》撰写的。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熊彼特离开德国的波恩大学，转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工作。

作者和这些传记文章的主人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他钦佩他们的工作的关系，而且也因为他和他们中的一些人彼此熟悉，特别是和其中几位还有着深厚的友谊。但马克思是一个例外，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而熊彼特则和凯恩斯一样，恰好在这一年出生，凯恩斯是十位经济学家中最年轻的一位。熊彼特和马克思有着一点相似之处——那就是对经济过程有着相同的看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试图提出“一种关于经济变化的纯经济理论，也就是说，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建立在推动经济体系从一种均衡过渡到另一种均衡的外部因素的基础上的”。在这本书的日文版的序言里，熊彼特写道：“开始时我不清楚，但对读者来说很快就会看清，到底是什么思想、什么目标（熊彼特本人的）和构成马克思的学说的这些思想与目标完全一致。实际上，他与同时代及过往的经济学家的区别就在于对经济过程的看法，即这种过程是否是由这个经济制度本身所引起的。而在其他各方面，他只是引用李嘉图的说法和观点，但是把关于经济发展的概念置于次要的黑格尔的背景中，却是他自己的见解。这可能是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总是不断地提起他的原因，尽管他们对这一概念也有很多不认同的地方。”在他的《经济分析史》手稿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他的思想框架中，发展不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经济静学的附属物，而是该时期经济的核心问题。他分析的重点落在了揭示经济过程怎样被自身逻辑决定，以及不断变化的整体社会的结构

上。”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推导出来的结果却大不一样：它使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社会，而使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的辩护人。

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学是一门要借助于长远眼光和纯熟技术的学科。他推崇马克思关于经济过程的眼光，同时也推崇与他仅有一面之缘的瓦尔拉的纯经济理论。关于这点，他在《经济分析史》里这样说：“经济学就好像是一辆大公共汽车，它搭载着许多兴趣和能力不相称的乘客。单就纯经济理论来说，我认为瓦尔拉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均衡体系把‘革命的’创造性和古典的综合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是唯一能和理论物理学的成就相提并论的经济学家作品。”

马克思与瓦尔拉则完全不同，他们一个试图给出经济变化的逻辑解释，另一个则给了我们一个“理论工具，它开创性地在我们的科学史上有效地使用了经济数量之间互相依赖的纯粹逻辑”。

熊彼特的特点是：对历史的和纯理论性的东西、计量经济学和收集到的大量实际资料、社会学及统计学，他持肯定态度，认为它们有用。他如此广泛的学术兴趣也反映在这些传记性的作品中。

在维也纳学习期间，熊彼特就认识了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门格尔和他的两位弟子——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可以算是奥地利学派的共同的创始人。那时门格尔已从大学退休，熊彼特也只和他见过一两次，但是这些传记还是翔实可信的，因为其作者是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研讨班的积极参加者（1904—1906年）。后来，他和庞巴维克就利息率的问题展开了一次著名的论战；1921年，在庆祝维塞尔诞辰70周年时，他是3位发言者之一。

虽然他很看重奥地利学派，而且在这个学派中受到了学术训练，但实际上，他对提出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另一个学派——洛桑学派更感兴趣，这个学派就源于瓦尔拉的著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其实是帕累托。帕累托原来是瓦尔拉的学生，后来又接替瓦尔拉在洛桑大学担任了政治经济学教授一职。直到现在，对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来说，他们的著作也是过分“数学化”、过分“理论化”了。同时，英、美经济

学家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即阅读用其他文字写就的经济学著作事实上是很困难的（也许是浪费时间）。但是洛桑学派在早期就有了两位一流的美国信徒——欧文·费雪和 H. L. 穆尔。本书中的 10 篇文章中有 3 篇是献给瓦尔拉、帕累托和费雪的。在关于帕累托的文章中，熊彼特特别描述了一次聚会，会上谈论了许多经济学家，而当时帕累托对欧文·费雪大加赞扬。熊彼特说：“在我听到他（帕累托）高度评价（费雪的）《资本和收入的本质》时，不免感到意外。”

1906 年，熊彼特在维也纳获得学位以后，又到英国生活了几个月。在英国期间，他拜访了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在 1907 年首次遇见了马歇尔。熊彼特在 1933 年 12 月写给《经济学杂志》的有关凯恩斯的传记文集《精英的聚会》（*Essays in Biography*）的书评的注释中描述了这次会见。在评论凯恩斯写作的关于马歇尔的文章时，他写道：“当我在 1907 年的某一天早餐时间隔着桌子看到他时，我告诉他（马歇尔）说：‘教授，在我们谈了关于我的科学计划之后，我的确感到我就像一个莽撞冒失的恋爱者正在尝试一个不可靠的婚姻一样，而您就像一位慈祥的老者试着劝我放弃这个危险的念头。’他回答道：‘事情本来就是如此，如果在这方面能有什么作为的话，老人的劝告就没有用了。’”熊彼特在本书中表明了他对马歇尔著作的态度，这篇论文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之后，他收到玛丽·马歇尔^①于 1941 年 6 月从英国剑桥寄来的一封短信。信里说：“刚收到这期的《美国经济评论》，我正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你写的关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 50 周年的纪念文章。看得出你对他的著作评价很高，我很高兴地看到你能借此机会如此热烈地、恰当地表达这种评价。这篇论文的最后一段尤其使我感到欣喜。我也和你一样欣赏凯恩斯写的《纪念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一文。”

而在评价美国经济学家（陶雪格、费雪、米切尔）时，熊彼特可能和

① 此处指玛丽·佩利·马歇尔，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夫人。——译者注

他们刚刚认识。那是在1913—1914这一学年，我记得熊彼特好像是作为交流学者去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在此之前，他也曾阅读过他们的著作，好像还和陶雪格通过信。陶雪格于1912年11月27日从剑桥写了一封信给他，在这封信中，他对这位青年经济学家的英文水平表示赞赏，然后讨论了后者提出的一个理论问题。“我对于你的论证没有什么异议，但我还是觉得应该以更现实的观点来探讨这些问题。”陶雪格还随手附上了一些供给图表，并说道：“我想把和资本、土地一样的论证运用于劳动力，并发展一种‘租赁’劳动理论。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草拟出一个大纲。你可能也知道，我的朋友J. B. 克拉克也进行过这种论证，而后来欧文·费雪也进行了更仔细的论证。但是这个论证到现在还没有最后的结论。我并非是如此狂妄自大，以至于认为这个结论应该由我做出，但我确实希望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贡献。”双方的友谊一直持续到1940年陶雪格逝世为止。实际上，在熊彼特到哈佛的头几年（1932—1937年），他和陶雪格一直住在斯考特街2号。

同样地，他对欧文·费雪和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也很钦佩，与他们也维系了一定的友好关系。他和费雪共同创办了计量经济学会。当熊彼特到费雪位于纽黑文的俭朴的家中做客时（那儿没有烟、酒、咖啡，甚至连肉都没有），咖啡是为这位“堕落的”客人特别准备的。阿尔及尔大学的G. H. 布斯凯教授在1950年第3期的《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上描述了这次在周末进行的交谈。本书中纪念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逝世的文章是熊彼特在逝世前一两个星期完成的。米切尔和熊彼特有着共同的学术研究——研究商业循环，他们都相信，为了更好地分析这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现象，需要最广泛的实证研究。熊彼特不辞辛劳地独自收集资料，在此过程中几乎没有获得来自他人的帮助，因为这就是他的工作方式，但是他对那些能够明智、有效地利用国家经济部门的有关资料的人十分赞赏。

虽然凯恩斯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担任《经济学杂志》的编辑，而熊彼特也从1920年起就担任这个杂志在奥地利的通讯员职务，但双方直到

1927年才见了面。由于一些微妙的、很难解释的缘故，他们两人的关系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专业角度来说，都不十分密切。

对评述瓦尔拉、门格尔、庞巴维克的那3篇文章的翻译曾遇到过麻烦。正如保罗·斯威齐在他的《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序言及哈伯勒早些时候在《经济学季刊》中指出的那样，由于应用德文写作，所以熊彼特的文风特别难翻译。哈伯勒说：“他的富于书卷气的笔调，也许用‘奇异的风格’来形容最合适，这种风格恰好能表现他的复杂的思想结构。这种风格的特征表现在大量的长句子、大量的修饰短语、对修饰语的再修饰，以及对含义差别的辩解上。他的这些风格特征，正如人们所提到的，在他的德文著作里特别显著，这是因为德语更适合于复杂的结构。”熊彼特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关于庞巴维克的那篇文章。他认为那篇文章太冗长，应加以删改，并为英语读者而重写。他着重指出，不那样做是不行的。

关于庞巴维克的文章，本书中所收录的相比原作已经删去了一半。这项工作是由哈伯勒和文章的译者赫伯特·查森豪斯教授一起进行的，而赫伯特·查森豪斯是熊彼特的学生。在这儿我要表达我对哈伯勒教授及3位译者的感激之情，感谢他们慷慨的关心和帮助。我还要感谢保罗·斯威齐，他和我一起阅读了全书，并在此过程中帮我润色了英文及在多处澄清含义。出于某些考虑，我不得不对有些章节中的过于直译和模糊不清之处做了一些修改，修改的重点就是那篇关于庞巴维克的文章，因此它的责任完全在我，由我一人负责。

其他的论文都是用英文写的，这次也就保持不动了。除了一些小的印刷错误，以及为了保持格式的一致而做的一些小的改动——如大写字母、标点符号、注释的排列等之外，没有再做其他改动或修订。

伊丽莎白·布迪·熊彼特^①

1951年2月2日

① 伊丽莎白·布迪·熊彼特，熊彼特的第三任妻子。她也是哈佛大学的一名经济学家，于1937年与熊彼特结婚。——译者注

目 录

contents

卡尔·马克思	1
一、马克思——一个预言家	3
二、马克思——一个社会学家	7
三、马克思——一个经济学家	21
四、马克思——一位导师	45
马利·爱斯普利·里昂·瓦尔拉	61
卡尔·门格尔	67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	77
一	77
二	79
三	83
四	86
五	88
维尔弗来多·帕累托	94
一、生平	97
二、理论家	102
三、社会学家	116
欧根·冯·庞巴维克	123
一	125
二	129
三	136
四	136
五	140
六	147
七	152

弗兰克·威廉·陶西格	167
一、早年（1859—1880）	167
二、事业上升期（1881—1900）	171
三、中年（1901—1919）	177
四、元老（1920—1940）	183
欧文·费雪	191
一	191
二	192
三	196
四	198
五	199
六	202
七	203
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	205
一	205
二	208
三	212
四	216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220
一	220
二	222
三	225
四	227
五	231
六	235
七	237
八	243
附录 A 乔治·弗雷德里克·克纳普	247
附录 B 弗雷德里克·方·维塞尔	250
附录 C 拉地斯劳斯·方·鲍尔特凯维兹	254

卡尔·马克思

(1818—1883)

马克思主义学说^①

绝大部分融合人类智慧或想象的作品，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就永远过时了。这一时间，也许短暂如茶余饭后的片刻，或者漫长如经历一代人的沧海桑田，然而它们终究逃不脱被遗忘的命运。有些作品却不是这样，它们此刻也许是黯淡的，但一定会有复兴的时刻，到那时它们会以各自的形式，带着人们可以目睹手触的各自的烙印，作为文化遗产中可以被辨识的成分重新绽放光芒。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为伟大的作品——这一定义把伟大和生命力联系在一起，并无不妥之处。按照这个定义，伟大一词毫无疑问是适用于马克思（Carl Marx）的学说的。但是，不容忽视地，将生命力的复苏纳入伟大的定义范畴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我们在界定一个作品伟大与否时可以脱离私人的爱憎之情。我们不必以为伟大的成就，不论在基本宗旨方面或在细节方面，必然有着光明的来源，必须是完美无瑕的。与此相反，我们可以相信它是黑暗的力量；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根本错误的，也可以在若干具体问题上持不同意见。对于马克思理论，正是由于那些非难或甚至完全否定没能给它以致命的打击，故而最终引起了整个理

^① 选自约瑟夫·A.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年版，经哈培尔兄弟出版公司允许重印。——原注

论体系感召力的爆发。过去的 20 年是目睹马克思主义复兴最有趣的时期。首先是它在苏联的复兴，这位社会主义所信仰的伟大导师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享有盛誉是很正常的。另外，在这里，马克思学说经典化的过程表现出一个特点，那就是横亘在马克思学说的内涵和布尔什维克党的行为实践、意识形态之间的鸿沟，它巨大如谦卑的基督教义与其笼罩下的教徒或中世纪战争时期的军阀的行为实践、思想体系之间的差距。

但是另一处的复兴就不这么容易解释，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复兴。这一现象是很有趣的，因为一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无论是在美国工人运动中，还是在美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中，都没有强调马克思学说重要性的笔调。当时，美国所有的马克思主义都是肤浅的、不重要的和没有地位的。此外，布尔什维克式的复兴，在之前那些最为马克思观念所浸染的国家此时也失去了本应有的冲击力。尤其是德国，所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传统最为显著的一个，在一战后的社会主义兴盛时期和过去的萧条时期的确始终存在一个规模不大的正统马克思学派，但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人物（不仅是和社会民主党联盟的那些人，还有在实际问题上比社会民主党的谨小慎微的保守主义走得更远的那些人）对于恢复原来的教义没有表示出多大兴趣，对马克思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在对经济问题的解释上，也和其他经济学家如出一辙。因此，在俄国之外，美国的现象是一枝独秀。我们无须追究这一现象的起因，但花费片刻思考一下许多美国人所形成的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轮廓和意义，也是值得的。^①

① 我们尽量不多引用马克思的著作，且不提供关于他生平的资料。这些是不必要的，因为想得到马克思著作的目录和关于他生平资料的读者，可以在任何字典里找到他所需要的一切，特别是在《英国百科全书》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里。研究马克思，从《资本论》第 1 卷开始最方便（第一部英译本的译者是穆尔和艾威林，编者是恩格斯，1886 年）。在传记方面，虽然有大量的新近作品，我仍然认为 F. 梅林的著作是最好的，至少从一般读者的观点来看是如此。——原注

一、马克思——一个预言家

我并非因为偶然疏忽而拿宗教术语来类比马克思的身份，硬给这一章冠以此标题。这不只是类比，因为在某种重要层面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对其信徒来说，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关于最终目的的学说，这些最终目的体现着人生的意义，并且是检验各种事件和行动的绝对标准；其次，它是达到这些目的的指南，它指引人们如何实现自我救赎，它指出罪恶所在，以使人类或那些“被选中”的群体脱离这种罪恶。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详细说明如下：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也属于教化人们“得善终”的那一支流派。我相信，如果圣典学家将以上特征总结并纳入宗教体系，会为马克思主义的分类和评论提供方便，这样做可能比纯粹经济学家的任何说明都更深入地指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本质。

以上做法的一个无心插柳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性解释了其成功的原因^①。纯粹的科学成就，即使远比马克思所达到的更为完善，也从来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永垂青史。他的政党所拥有的强有力的特殊武器库——政治口号也无法做到这一点。他成功的部分原因，虽然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其实应归功于他给他的信徒准备的武器——在任何平台都可以随时使用的大量白热的成语、激昂的控诉和愤怒的手势。关于这一点不得不说的是，这种武器过去起到了、现在也正在很好地发挥着它的作用，但它的产生也带来了一种不利影响：为了给滋生社会冲突的战场制造这类武器，马克思有时不得不曲意逢迎，或是偏离他的学说体系按正常逻辑所应

^① 马克思主义的宗教性也说明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反对派的特有态度。对于他们而言，就像对任何宗教信仰一样，反对者不但观点错误，而且身怀罪孽。他们不仅从理智上，而且从道义上不准持有异议。一旦“启示”被公布，持有异议就不可能得到饶恕。——原注

得出的结论。然而，如果马克思能做的只是提供一些煽动性的言论，那他现在早就湮没无闻了。人们从不会为此类服务而心存感激，他们总是很快就会忘记那些会自编自导政治歌剧的人的名字。

但事实证明，他是一位先知。为了理解这一成就的内涵，我们必须从他所处的时代着手考察。那是资产阶级成就的鼎盛时期，也是其文明的低迷期；那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时代，当时的文化环境尚未显露出任何孕育新文艺和新生活方式的迹象，到处充斥着让人反感的陈腐糜烂气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信仰都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唾弃，工人世界的唯一一线光明（除了从罗奇代尔^①和储蓄银行所得到的些许安慰以外）也随着消逝了，而知识分子则自称十分满足于穆勒^②的《逻辑》和济贫法。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马克思学说中提出的人间社会主义天堂给无数人带来了光明和新的人生意义。人们大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宗教”随意称为冒牌货或对信仰一词的戏谑之说（基于这一观点可以有多种表述法），但在调侃之余，不要忽视了作品本身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即使马克思学说不被大多数人所理解，那也没有关系，因为这几乎是一切伟大作品的共同命运。然而，重要的一点是，这一学说在产生之初是为了让那个时代具有实证主义思想的人所接受而组织和传达的。毫无疑问，实证主义思想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那么将马克思主义称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也是合乎情理的，其具体可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它（学说）一方面以拥有超乎想象的力量措辞系统及对受挫折和被虐待心情的详细描述，使那些用自我治疗方法安慰自己的失败的大多数从心底产生共鸣；另一方面它又宣称社会主义拯救人们脱离苦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经得起各方考验的。

① 罗奇代尔是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小镇，1884年，因生活困苦不堪，28名纺织工人在这里成立了罗奇代尔先锋合作社，创设初期的办社准则为罗奇代尔原则，即入社自由，民主管理，收益分享，重视教育，恪守中立。——原注

② 即约翰·穆勒，英国19世纪著名的心理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是古典经济学最后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受边沁、李嘉图的影响，他支持功利主义和折中主义。——译者注

在那个时代，正在没落的宗教遗留给人们一些超理性的渴望，这使他们如丧家之犬一样失去理智，但是当时的大趋势却难以避免地由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所主导，它们不能容忍任何没有科学或假科学内容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把这些超理性的渴望和理性主义与唯物主义的趋势成功地交织在一起，这是何等高超的技术！单纯针对最终目的的说教往往收效甚微；单纯针对特定社会进程的分析又可能只会引起少数专业人士的关注。但披着分析外衣的说教并能够直指人心，是马克思赢得热烈拥护的原因并因此为其追随者赢得无上的褒奖，它包含在这样的信念中，即人们不可能因为他的信仰而被打败，恰恰相反，他们会因这一力量而取得最后胜利。当然，坚定人们的信念只是其全部成就的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信条中体现的个人的力量和预言的火花相对独立地起作用，没有它们，新的生活和生活中新的真谛就无处产生。但这并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

另外，不得不提到关于马克思试图证明社会主义归宿的不可避免性这一做法的中肯性与正确性。事实上，上面提到过的他对于失败的大多数心理的系统描述的一句评论就足够了。诚然，这样的描述并非有意识的或是潜意识里真实的情感抒发。我们倒可以把它看做一种试图以对社会进化或真或假的揭示来代替真情实感的行为。然而，这一行为及他为将术语“阶级意识”加于人民而做的努力，毫无疑问地体现了他对工人心理的错误解读（工人的真实心理是成为小资产者，并且要借助于政治力量来取得这一地位）。但是只要他的教导产生影响，他也就扩大了追随者队伍并为之增添了荣誉。他没有为了自己勾勒出的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洒落任何多愁善感之泪。这是他自认为自己的学说比所谓“乌托邦社会主义”更优越的一点。他也并未像资产阶级那样，在担心得不到利润的时候，喜欢将工人颂为终日勤劳的英雄。他完全没有拉拢工人的倾向，但这种倾向在他的某些不够坚定的信徒中是极为明显的。关于人民大众这个词的含义，马克思具有很透彻的理解。他所关注的是整体的社会目标，而这些远超出了工人

的思想和需求范围。另外，他从不教导大众去实现他个人的理想。他没有这种虚荣心。正如任何真正的先知都自称为他的神祉卑微的代言人一样，马克思从没妄想传播历史客观进程的逻辑之外的事情。这一切所表现出的庄严弥补了许多偏狭和俗鄙，这些也成为他的作品和生活中奇特的组合。

最后，还有一点也不应当略而不提。马克思个人的修养很高，那些目不识丁的庸俗社会主义教授完全不能与他相提并论。他能极其精准地理解文明及这种文化价值的“相对而言的绝对”价值，无论他自己感觉与这种文明相隔多远。在这一方面，我们提不出比《共产党宣言》更好的证据来证明他的博大的胸怀和广阔的眼界。在这一宣言里，他也热烈地赞扬^①了资本主义的成就；即使在他的学说里宣布资本主义未来必然灭亡时，他也从没有不承认它的历史必然性。诚然，对资本主义的这一态度暗示了许多马克思本人内心本不愿接受和承认的事情。但毫无疑问他的态度是很坚定的。他关于历史的理论对事物的有机逻辑做出了特定的阐述，认识到这一点，使他更容易采取并坦然接受这种几乎有些“决绝”的态度。对他来说，社会事物都有一定的轨道。也许在他生平中的某些时候，他很可能是潜伏在某个咖啡店中的阴谋者，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内心的确是蔑视这类事情的。对他来说，社会主义不是要消灭其他一切生活情调并对其他文明制造不健康的，甚至愚蠢的憎恨或轻蔑的一种痴迷。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意志是基于他的根本立场而结合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他的社会主义被命名为科学社会主义，这从各方面来看，都是说得通的。

① 这一说法看上去似乎言过其实。但让我们引述一些由权威机构翻译的英文原文：“资产阶级首次证明了人类的活动能够取得怎样的成就。它创造了超越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哥特式教堂的艺术奇迹。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都卷入文明的旋涡里了，它创建了规模巨大的城市，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未满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比过去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我们看到，一切的上述成就都仅只归功于资产阶级，这比许多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宣称的还要多。这也就是上面那段文字里我所讲的全部意义——这和当下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或近代非马克思的激进派的凡勃伦主义的作品迥然不同。——原注